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5.09.009

远方的兄弟:庄学本与西部土司 交往及社会调查考

朱靖江^{1,2}

(1. 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2.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1934-1939年,民族志摄影家庄学本在中国西部的四川、青海、甘肃、西康诸省游历考察,先后结识了杨继祖、索观瀛、华尔功臣烈、李承襄、林沁旺济勒、王寿昌、德钦旺姆、岭光电等藏、土、蒙、彝各族土司,并与其中一些开明进步者关系密切。综观这些曾与庄学本有过人生交集的末代土司们,大多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在中国西部的高山草地之间纵横捭阖,而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他们最终审时度势,彻底放弃了土司的身份与权力,踏上一条人生的新路。庄学本的旅行日记、调查报告、报刊文章以及摄影作品,以一种民间叙事的角度讲述了那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土司制度、地方传统与民族文化,同时,庄学本在各地游历交往的经历,也具身性地展示出土司政治中的历史细节与人性侧影,为我们理解20世纪前半叶的西部少数民族土司文化,提供了鲜活的个案资料与宝贵的影像文献。

[关键词]土司;庄学本;西部民族;社会交往;影像文献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5)09-008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为基础的影视人类学研究”(21BSH1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靖江,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影视人类学、边疆影像史、纪实影像。

庄学本(1909-1984)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西部地区的考察与影像、文字文献,近二十年间研究者日众。作为一名杰出的摄影师与游离于学术界之外的民间学者,庄氏复杂的人生履历与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串联起影像学、历史学、边疆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既内涵厚重,又颇具传奇色彩与时代意义,代表了民国时期部分知识人“在国疆边缘扮演知识发掘者与沟通者的角色,将国族知识带入边疆,并将边疆情况带给国人。”^{[1]258}的社会思想与文化行动。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多从摄影美学、民族文化、地方民俗乃至人类学价值

等视角探讨庄学本的影像成就与学术贡献,但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正统学人不同,庄氏有其“江湖气”的一面,他与当时中国西部各阶层人士的往来更为密切,特别是与那一时期权力尚存的少数民族土司多有交往。在他的影像作品与文字记述中,留下不少珍贵的文献,记录了中国最后一代土司的形象与事迹。与此同时,由于庄学本为人敦厚可亲,行事持正,待人平等,故而是多与土司、头人的往来不止于泛泛之交,而是多有情感关联与事务合作,甚至成为“结义兄弟”,这在当时的汉族文化精英当中颇为少见,是一种“兄弟之谊”推进民族交往交融的早期范

例,值得我们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语境当中重新体认与评价。

一、庄学本的“羌戎考察”与土司交往(1934-1935)

1934年春,时年25岁的庄学本以杂志“特约摄影师”的身份,追随中华民国政府派出的“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团抵达成都,意在探访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西藏地区。因致祭专使黄慕松将军拒绝携其同行,庄氏亦无法自行进藏,便决意更改行程,探索汉人行迹罕至的“野番白地”俄洛(今青海省果洛州)。他先从“开发西北协会”负责人马鹤天处获得了一份“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委任状,又请求驻成都的军政要员与社会名流——如邓锡侯、杨森、张国维、金豹卢等人,为其开具边地旅行所需的护照和介绍信,最终在一位名叫索囊仁青的“戎人”(嘉绒藏族)陪伴下,踏上了自灌县上溯岷江,经汶川、茂县、理番、阿坝草地而入俄洛的漫漫旅程。

(一)羌民戎官:九子屯守备杨继盛

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川西北经历了国民革命军第28军三攻黑水、红军长征过川西北、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及抗战动员等重大事件。这个时期是川西北土司土屯变化最大最复杂的时期。”^[2]庄学本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闯入川西北的土司辖区,结识了一批即将成为风云人物的末代土司们。在理番县,庄学本见到的第一位“土官”为九子屯守备杨继盛。在1940年由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主持编纂的《川康边政资料辑要:理番》卷中记载:“九子屯在理城之东,额设守备杨继盛,驻二瓦寨,距治城十二里,增设守备王贵顺,驻水塘寨,共管十寨屯兵为五百名。”^{[3]447}庄学本于《羌戎考察记》一书中记述了他与杨继盛守备的会面:“我们走进一所很大的汉式衙门,此地是九子屯守备杨继盛的公署。穿过了一间挂着虎头牌、设有太师椅,而且还放有令箭的法堂,在内室的书房中受到了招待。……杨守备完全汉化了,因为他汉化得深,所以他染着和汉人同样的烟癖。”^{[4]38-40}

通过与杨继盛交谈,庄学本获知九子屯为“羌民戎官”的统治结构。70年前,杨继盛的祖

父被失去贵族“根子”的当地羌民接纳为首领,传至杨继盛已是第三代土司。他也发现这位戎人守备治理的九子屯其实并不闭塞:“他的衙门里每年拜访的游客很多,尤其是成都的一帮外国人。”^{[4]40}庄学本所说的“外国人”应指以成都为基地,在羌戎地区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如陶然士(Thomas Torrance, 1871-1959)、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 1884-1962)等人。据葛维汉的回忆:“1933年暑假,与陶然士为伴,我去了羌人和嘉绒藏人居住的杂谷脑地区考察。陶然士与羌人相熟,整个夏天他都在几个村子里布道,偶尔在山溪里为新教徒做洗礼。……我和陶然士一起去了九子屯,在那里观看了羌人的舞蹈,之后又转去杂谷脑观看嘉绒藏人的舞蹈。”^{[5]129-130}陶然士在其著作《中国第一批传教士》(*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中,也描述了他所见到的羌寨土司官邸:“在理番县城附近有一幢土司府,还能够感受到旧土司制度(Chieftainship)的特点:集法庭、城堡与农舍于一体。在别的地方还能看到这样的混合物吗?它令参观者仿佛回到了宗法时代。土司统治的令牌、司法行刑的木棒就摆放在大堂的门口,而这栋房屋里也存放着各式农具。一步之遥,我们就好像回到了古老的《创世纪》年代。”^[6]陶然士对土司府邸的描写与庄学本所见相近,或同为对九子屯官署考察的结果。葛维汉与陶然士之记述,说明九子屯、杂谷脑等羌、戎聚居的川西土屯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已非外界想象的那么抱残守旧,国民政府的政治影响、军阀势力的推进渗透、西方基督教士的传教布道,以及庄学本等外来知识分子的探访交流,已经为当地人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世界、突破传统束缚,甚至反思自身族性、实践社会变革的新节点。

(二)嘉绒藏族的基督徒:杂谷屯守备杨继祖

在理番县什古脑(今杂谷脑)区,庄学本遇到了他此行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杂谷屯守备杨继祖(1910-1991)——他也是九子屯守备杨继盛的二弟。据《川康边政资料辑要:理番》卷记载:“杂谷屯,在理城之西六十里,为苍旺土司故地。守备官寨在沱江右岸,格山老寨原辖三大沟,即胆战木沟(庄记为丹扎木沟)、打泗沟、梭

罗沟,共计二十八寨。额设屯守备二员,其一守备高承谦,及其子高良高翔,相继死后,无人承袭。其一守备包德惠病故无嗣,而包女(包淑芬)原为高良妇,现大归于包,赘九子屯杨守备继盛之弟继祖,顶包氏门户。”^{[3]446} 庄学本在丹木扎沟的杂谷屯衙门,见到了时年 24 岁的杨继祖。二人年龄相近,庄氏对这位年轻的守备颇有好感:“我们一见面,就知道他是一个脑筋清楚青年,看他的装束和听他的说话,谁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戎人,他简直是一个汉人。他曾在成都读过书,并且还是茂县的‘军官训练班’毕业生,所以中文和军事都有相当的根底。五屯的守备中只有他没有染着大烟的嗜好。”^{[4]127}

有关杨继祖的早年经历,阿坝州学者徐吉廷有更为详细的介绍:“清宣统二年(1910 年)9 月 19 日,杨继祖出生于今四川省理县木卡乡^①,6 岁至 12 岁在家读私塾,此间,参加耶稣教,并接受洗礼。民国十二年(1923 年)下半年到成都华美中学读书。”^[7] 成都华美中学为美国传教士毕启(Joseph Beech, 1867-1954)于 1903 年创办,是四川最早设立的教会学校之一。杨继祖的基督教徒背景,或为庄学本在杂谷屯所见的一系列土司“新政”提供了信仰的支撑:“杨主任果然是一位有新脑筋的青年,他在衙门中已经革除了平民见官要跪的礼节,同时从前在守备衙门中永远做马牛的奴婢也给他解放了。”^{[4]128} 因此,庄学本称杨继祖为“什古脑的林肯”,其实也是暗示了杨氏的基督教价值观,而他拥有的嘉绒贵族血统,也为其实实施一定程度的改良政策提供了身份保障。在理县驻留时,庄学本与杨继祖一家往来密切,还为杨氏夫妇、杨继祖的继女包惠卿等人拍摄了多幅照片,并有庄、杨二人的合影。

(三) 拜把子的袍哥弟兄:杂谷脑区长王荫三

除了杨继祖之外,庄学本与时任杂古脑区长的王荫三(1906-1982)也有交往。王荫三为汉人,出生于 1906 年,曾在四川彭县、理县从事过军事政治工作。“1929 年王荫三回理县后,先后任杂谷脑小学校长,杂谷脑团总、区长等职,由于他广交朋友,为社会各阶层敬重,并为后来县官、专员所重视,成为理番县举足轻重的人

物。”^{[8]782} 尽管在庄学本所著的《羌戎考察记》中并未讲述与王荫三的往来,但据王荫三之子王毓贤回忆:“我父亲(王荫三)当时是杂谷脑区的区长,杨纯武(即杨继祖)当时是杂谷脑乡长、联保主任。庄学本、我爸爸、杨纯武三个就在杂谷脑武庙结拜为弟兄。结拜为弟兄以后,最后庄学本回到上海后,都还和他们通过信。”^② 这是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中,唯一可证明庄学本在进入川西羌戎地区后不久,即与当地藏、汉领袖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口述材料。

这三人当中,王荫三年齿最长,他“在袍哥方面先后担任杂谷脑掌实权的副舵把子,马塘正舵把子并兼掌松岗码头的挂名副舵把子,成都市部分街区‘群英社’的副舵把子,人称王大爷。在‘四土’的少数民族中影响也较深。”^{[9]2678} 三兄弟“结义”的动议很可能由他提出,并得到了庄学本与杨继祖二人的同意。之所以如此,原因或为庄学本“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身份,以及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曾“去电通知屯殖督办署保护”^{[10]32}、并为庄学本开具通行护照的襄助之举,而王荫三则是邓锡侯在杂谷脑的生意代理人,故视庄氏为一位值得拉拢的重要人物。至于他们在武庙结义,也带有浓重的袍哥色彩:“(袍哥)把桃园结义作为相互关系的楷模,把义薄云天的关公奉为崇高行为的典范,把江湖义气作为行为准则。”^{[11]11} 据史料记载,王荫三与杨继祖皆为杂谷脑袍哥帮派“吉安公”、“协兴公”的“舵把子”^[12],也就是袍哥大爷。“袍哥大爷是有维护公共秩序责任的地方官吏,地方官吏也是有江湖规矩的袍哥。二者的结合,实际上是袍哥势力有着对社会广泛而深入的掌控但缺乏官方身份和权力,而国民政府虽有着官方身份和权力但却缺乏对社会广泛而深入的掌控,彼此各取所需所造成。”^[13] 而庄学本之所以愿意与王、杨二人结拜,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当地“袍哥与官吏同构”体制的理解与妥协,另一方面则是将杨继祖视为嘉绒藏族土官当中的开明人士,对他解放奴婢、兴办教育、推动平权等政策予以认同和尊重。当然,庄学本作为一名年少时代即在上海滩讨生活的“社会人”,这些“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江湖做派,他也未必多么生

疏或抗拒。

(四) 四土领袖:卓克基土司索观瀛

离开理番之后,庄学本进入由嘉绒藏族土司们统治的“四土”地区,即松岗长官司、梭磨宣慰司、党坝长官司与卓克基长官司的辖地。到达卓克基之前,庄学本还调解了一起汉族商人与藏族驮夫之间的冲突,避免一场血案,其人之见义勇为、且具有“卡里斯玛”(charisma)人格特质可见一斑。在卓克基土司衙门,庄学本见到了索观瀛(1900-1967),这位杰出的土司领袖令庄学本印象深刻:“他是一个三十许的人,头上还盘有一条发辫,同时他有一双大而突出的眼睛。索土司能讲很流利的官话,他真是一个漂亮的土司!我给他照相时,他改穿金丝龙缎的大领衣,换上狐皮帽,腰间挂上嵌有珊瑚的宝刀和金镶打火盒,端坐在铺着虎皮的太师椅上,他的威容真和皇帝一般。”^{[4]159-160}在《羌戎考察记》中,庄学本记述了索观瀛的身世:系汶川瓦寺土司索代兴(第22代瓦寺土司)之子,因卓克基前土司绝嗣,招索观瀛于1913年上门,成为第七代(一说为第十六代^{[14]20})卓克基土司。庄学本对其有较高的评价:“因为他生长在汶川,所以渐染汉人的习俗很深,不但能讲汉语,并且能通汉文。他办事的手段和思想,也比其他的土司灵活而老练。当然他在四土之中,是一位土司的领袖了。”^{[4]160-161}

即便如此,索观瀛治下的卓克基仍延续着森严的封建等级体制,官民皆需匍匐在他的脚下,土司具有无上权威。即便在这样专制保守的氛围中,庄学本仍然不忘其“开发西北协会专员”之责,劝说索观瀛成为现代国家体制的助力者。他在向索辞行时,“请索君领导民众将西北开发起来,则国家之厚望也。索并谓明后年将赴京沪一带游历参观,或充十八土代表至国府,申述西北人民之痛苦。余曰极表欢迎,并来至东南后盼将东南之文化以及物质文明灌输至山间,则他日西北之发展更不可限量也。”索观瀛也非常热情地送别庄学本:“临行又承送酥油一大块,炒面二袋,并遣乌拉二匹,其坐骑之骡子一头送行,且沿路并为书藏介绍信多封,情极殷殷。”^{[10]103}可见索观瀛与庄学本虽交往日短,却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情。庄为索氏及其家人拍

摄的多幅照片,也成为索观瀛担任卓克基土司时代最重要的一批历史存照。

(五) 草地结义:墨桑土司华尔功臣烈

庄学本于1934年7月下旬离开卓克基土司辖地,月底即抵达中阿坝墨桑土司官寨。8月2日,庄学本备礼“黄盘龙缎十方、手表一具、自来水笔一支”觐见当地土司。彼时,前任土司杨俊扎西已传位于其子华尔功臣烈(1915-1966),时年19岁。二人初见之时,土司“未启齿,凡有所问,均管家所答言。……继纵谈国内外情形,彼等以国内军事领袖为主席,余告以委员制,一切政治施行均决于会议,并告以东三省事及目前国家民族之危亡均旦夕事,吾侪须共同努力以谋民族于盘石。”^{[10]115}庄学本的到来,虽未有直接的交谈,或许令年轻的华尔功臣烈(庄氏在日记中记为“华而昆陈立拉而顿”)耳目一新。一周之后,当地头人向庄学本提出了两项请求,其一希望庄氏前往纳摩寺(即今郎木寺)调解一场汉藏之间的战争,其二希望庄氏与墨桑土司华尔功臣烈结拜兄弟。

所谓汉藏“战争”,系甘肃军阀鲁大昌进兵至纳摩寺附近,引发藏族民众恐慌,土司头人们以庄氏为“西北调查专员”,或有说和调解的能力,但庄学本自知“此地处于专制之地,西番又多疑,深恐不去则多疑,去则与行程时期大相冲突,且军人黠武,吾辈文人既无实力为后盾,故去亦无把握,而明日即将首途,虽事为民族、宗教,唯因无把握耳。”^{[10]117}这令庄学本心事重重,夜不能寐。尽管事发突然,且与庄学本的考察活动并无直接的关系,他还是慨然应允,决定亲赴纳摩寺,做这场战事的调解者。好在墨桑部落的头人会议之后,又有了新的决策:不必由庄氏亲往,唯请他修书给鲁大昌及其前线军队长官,讲述缘由,陈明利害,并派部落特使送达纳摩寺。此事议定之后,即安排庄学本与华尔功臣烈举行兄弟结拜仪式。

庄学本在其日记中记录:“管家请余与土司结兄弟,余询结拜之礼。余请与土司合摄一影,各执一纸即成。旋管家返,报谓小土司早已宣誓不照相,故除此外均可照办。余因闻土司迷信神权,且其祖为黑教所咒死,故不照相,余乃从其请,告以随蛮俗可矣。乃与小土司及杨君

(索囊仁青,汉名为杨青云,庄氏此行的向导兼翻译)叙于一室,余询其以前有否与人结拜,谓无。然则是吾侪均属初次结拜。乃相与小土司宣誓而毕,土司年十九为次,余廿六居长。”^{[10]117}庄学本称其与华尔功臣烈均为初次结拜,与王荫三之子王毓贤的回忆不甚吻合,此桩历史公案如今或难以察明。但是,年纪虽少却在阿坝雄踞一方的墨桑土司华尔功臣烈,为何执意与来自汉地的“不速之客”庄学本结为兄弟?由于缺乏其他文献的佐证,个中缘由恐难彻底探究。从“公务”出发,庄学本“西北开发协会调查专员”的身份以及他沿途受到各地土司的礼遇和关照或为“结拜”的原因之一:即位不到两年的华尔功臣烈希望以此拉近其与“中央”代表的关系;从“私谊”出发,一路上扶危济困的庄学本可能已在阿坝草原诸部赢得了良好的名声,特别是在墨桑部落遭逢战乱之际,他慨然应允出使调停,或许令华尔功臣烈心生敬意,最终决定以“结拜”的方式和庄学本建立起兄弟关系。在结拜仪式上,庄学本虽为外客,却是兄长,故对华尔功臣烈有所教谕:“宣誓后,余告以世界潮流之趋势,封建之不适于现在。故宜自动开发荒地,增加生产,建设交通,提倡教育,和睦乡邻等诸事,土司极致谢。……彼等询余飞机等及新时代之情形,余举以一一告之,彼均咋舌不已,并告目前为科学时代,非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则国家将不可救矣。”^{[10]117}

同年十月,庄学本自果洛游历归返墨桑官寨时,“土官出迎至外,相与入客室,互问安好,陈别后(之情)。旋其父杨俊扎喜来叙礼后,询余路上辛苦并留余多住数日。”^{[10]135}庄学本遂居停墨桑数日,其间华尔功臣烈用藏文书写呈文一件,委托庄学本带交屯区督办处。庄学本认为其行文过于繁复,“余视之不禁欲笑,彼因之大窘。余知其习惯使然也,乃令其稍改。”^{[10]137}这段描写的确有些“兄友弟恭”的意味,与那些江湖弟兄的势利油滑截然不同。当庄学本得知华尔功臣烈即将迎娶格尔底寺活佛的妹妹时,“余以把兄之地位依汉族应致贺仪,然不悉番俗应如何道贺,及于汉商处探悉番俗亦有送礼之举,乃遍思一身之外无长物,不足以礼仪,乃于杨青云处借得其新购卅五两之马

驹一头作贺,由马骧上缀红色长绸,鬃上扣哈达如结彩,乃拉至官寨,土官已得讯,见之大喜。”^{[10]139}当庄学本离开墨桑时,华尔功臣烈亦馈赠了鹿茸、狐皮、麝香、黑马等贵重礼物,以示深情。庄氏感怀:“以吾侪千里相逢一旦判袂,均有恋恋不舍之慨。”^{[10]139}甚至在墨桑土司治下常遭歧视的汉商也因为庄、华之间的兄弟情谊“为历来汉人官员之来此者所未尚见”,皆有扬眉吐气、与有荣焉的快意之情。

尽管我们缺乏二人后续交往的历史材料,但华尔功臣烈担任墨桑土司二十年间,“不仅鼓励本部落的人因地制宜地自由选择耕、牧兼务的手段发展生产,而且还鼓励本部落的人外出经营商业——这一条就是许多接近汉区的、甚至于藏汉杂居的部落都很难做到。华在发展商业、扩大物资源流通渠道上并不排斥外族人,对回、汉商人在阿坝经商,只要献上一根哈达就可以得到允许。由于提倡商业资本的发展,华对推动禁锢的雪山草地上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5]作为一名自幼生长于荒远边地的藏族土司,能够采取上述开明、进步的施政举措,若究其思想源流,“把兄”庄学本当年的劝诫与影响或许多少有之。

二、庄学本的甘青考察与土司调研(1935—1937)

1935年末,自果洛返回南京不足一年的庄学本受聘于国民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担任随行摄影师,再度踏上漫漫西行之路。翌年元旦,当班禅行辕仍在兰州筹备行动计划时,他已前往青海省互助县,做“土民”(即今之土族)的社会文化考察。在此之前,亲自前往土族聚居区躬身调查的学者极少,1932年,一位中文名叫许让(Louis Schram,又称“康国泰神父”)的比利时天主教神父在上海印行了一部名为《甘肃土人的婚姻》(*les traditions du mariage des monguor du gansu*)的法文著作,开启了中外学界对于“土人”研究的兴趣——其中文版由费孝通、王同惠夫妇合作于1935年译成,却因战乱与风波,晚至1998年才得以出版。1936年,庄学本开始在《申报》连载《青海土民考察》,又在《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连载《青海旅行记》,并有未发表的《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地理分布》手稿

存世——“兹鉴于年来国内学人对于西南民族之研究较勤,而于西北民族之研究稍疏,于青海土人具体之介绍更未一见,因就回忆所及草成此文。”^{[10]315} 尽管上述调查文本在中国民族学界声名不昭,影响有限,但庄学本对于土族的考察与研究仍具有先驱性的学术意义。

(一) 威风不再的土族土司

庄学本于 1936 年和 1937 年初曾两度考察青海互助、大通、乐都等地的土族聚居区,并数次会见了传承古老的土族土司。他在《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地理分布》文中,根据地方志及其调查材料,列出了李土司、东祁土司、西祁土司、汪土司、纳土司、陈土司、吉土司等土族土司的源流世系及其世居之地。他发现,与川康藏区那些实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嘉绒藏族土司不同,青海土族的土司皆已沉寂无力:“民国以来土司已改土归流,(民国)十六年自青海宅省后更雷厉风行,固早已失却其固有之权威,已移交于县府,但土人至今仍有向之当差送礼的。尝见桑思格前东伯府土司李承襄之名片上仍用‘碾伯世袭土司指挥同知’的头衔。”^{[10]319} 1936 年初,庄学本在互助县红崖子沟拜访了被迫放弃土司职位还不到五年的李承襄。“公元 1931 年(民国二十年),东伯府李土司李承襄牵头,同青海地区的其余土司祁昌寿、李沛霖、汪若祥、祁钦恩、纳弁业、吉树德等,为缓和各方的不满情绪,联名请求青海省政府‘取消土司称号,另易相当名称’。同年八月,青海省政府报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正式废除了土司制度。东伯府最后一任土司李承襄,挈妻带印,到他原先管辖的互助县五十沟桑斯格村务农。”^[16] 庄学本见到的李承襄前土司是“一位六十五岁,瘦销苍老的老叟,扶病出来,与我们寒暄。”他后来在《青海旅行记》中以《李克用后代》一节,介绍了李土司的传承世系以及昔日的权柄:“他在前清时,土司衙门的组织,有千总一名,把总二名,外副四名,千户一名,百户二名,士兵三百名,士兵是屯兵制,完全寓兵于农。民国以来,改土归流,土司失去了他的权位。”^[17]

在庄学本与李承襄土司往来寒暄之际,他还拍摄了李氏历代祖先画像共十一幅,以及明朝皇帝颁给李土司始祖李英“金书铁券”的三张

照片。考青海省档案馆于 1986 年曾征集到一枚“明代李文铁券”,上刻“尔右军都督府右都督李文负资忠义,秉志纯良,将略素闲,战功克著,兹朕复位之初,受以边防之寄,因胡虏之侵犯,遂克敌以成功,顾兹茂勋,宣隆恩典,特封尔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高阳伯,食禄一千石……”^[18] 等字,证实李文被封为高阳伯,且为青海土族李氏西伯府土司始祖。而庄学本于 1936 年所拍摄的“金书铁券”则为李氏东伯府旧物,其上镌刻的文字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人臣能效劳于国者必有封爵以贵之,所以彰其绩、报其功,至公之道也。尔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英蕴器□□,秉心方直,世居西土,效忠朝廷,事我皇祖皇考,屡著勋勋……”^{[10]318} 落款为“宣德”某年“二十四日”,可知该“铁券”为明宣宗朱瞻基颁赐给李氏东伯府始祖李英之信物。又据《明史·李英传》记载,李英于“宣德二年封会宁伯,禄千一百石”,若以封爵而获“铁券”之例推断,该券应产生于 1427 年,较李文铁券(天顺二年,即 1458 年)更早 31 年。这两枚“铁券”完整地讲述了李英、李文(二人为从父子关系)在明朝前期的政治、军事地位,以及青海土族李氏东伯府(会宁伯李英支系)与西伯府(高阳伯李文支系)土司的世系源流,极具历史文献价值。可惜的是,李英铁券如今已下落不明,所幸的是,庄学本拍摄的铁券照片,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记录。

(二) 走向没落的蒙古族王爷

1936—37 年,庄学本在参与“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的行程中,先后与多名青海、甘肃的蒙古族王爷打过交道,以图了解青甘蒙旗牧民的生存状况,以及蒙人领袖的权力运作方式。1936 年 2 月,庄学本来到群科滩(时为湟源县属地,后归海晏县管辖),在一座黑帐房前下马,一位蒙古族老者拉起幕帘请他们进去休息,此人就是绰罗斯部南右翼头旗(又称尔力克贝勒旗)的郡王林沁旺济勒,“他简朴的装束(穿一件普通的老羊皮袄),几乎使我们误认为一个普通的百姓。”^[19] 庄学本在这位蒙古郡王的帐房中过了一夜,被款待以奶茶、牛肉和留声机放出的流行乐曲。他发现林沁旺济勒是一位见多识广、思想开通的老人,曾去过七次北京,亦能讲几句

汉语：“民国初年，他曾受到黎元洪总统的二等勋章，民国二十年青海的蒙旗组织略变，他遂被任为右翼正盟长，现在他有导挥青海东部十二旗的权力。”^[19]

据《海晏文史》记载，林沁旺济勒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 年），原名仁青旺秀，系过继给上任尔力克贝勒为子嗣之后，袭承了王位。“民国二年，袁世凯复封当时的尔日克贝勒王爷林沁旺济勒为多罗郡王。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时，中央设临时参议会，林沁旺济勒先生曾任参议员。”^③可见在当时，这位郡王曾经是一名地位尊贵的政治代表。庄学本从林沁旺济勒处，得知了在群科滩驻牧的八个蒙旗及其领袖的名称与爵位，但他发现：“郡王、镇国公、辅国公、札萨克、大喇嘛，都是清朝封他们的爵位，各旗王公所辖的百姓，都不过几百个帐房或几十个帐房，所以势力很小。最小的一旗巴汗绰尔札萨克，据说只有两家百姓，这个王公已经有名无实了。”^[19]在民国时期，青海蒙古族同时遭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压迫，其一是同为游牧民族的番人（藏族），庄学本指出青海蒙、番两族的装束迷离莫辨，“据传说近来青海的番族势力强盛，蒙族势力渐次式微，故服式遂染番化，甚至语言文字也各有倾向番人的趋势”^[19]；另一压迫者则是统治青海多年的马步芳集团：“在马步芳窃据青海大权后，倒行逆施，苛政猛于虎，曾以莫须有的罪名，罚了林沁旺济勒盟长军马 50 匹、步枪 50 支，从此他的家境就大不如前了。”^③翌日告辞离去之前，庄学本为林沁旺济勒郡王和他的夫人（当地人称“王奶奶”）各拍摄了一张威严而不失慈祥的照片，而他在上海《申报》连载了两周的《群科滩蒙旗》游记，也将这片蒙古族游牧之地的风土人情，带到了千里之外“大上海”读者的眼前。

三、庄学本的西康考察与土司交往（1937—1939）

1937 年 11 月，庄学本见九世班禅返回西藏之行无望，他随之入藏考察的计划也化为泡影，遂以寻找在抗日战火中失散的亲人为由，离开了“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从青海玉树向东出发，踏上经石渠、甘孜通往康定（又称打箭炉）的康北道，这也开启了庄学本在西康（西康建省

委员会成立于 1935 年，西康正式建省于 1939 年）游历调查的新阶段。

（一）风雨前夜的康巴女土司德钦旺姆

1937 年 11 月 27 日，庄学本抵达川边重镇甘孜县。翌日，在县政府举行的一场接风宴上，他认识了孔萨部落女土司德钦旺姆。在其手稿《十年西行记》中，庄学本写道：“甘孜是雅砻江北岸的一个县城，这里的酋长是一位妙龄的‘西番’女子，名叫德清汪姆（即德钦旺姆），很能于大方，颇受她的人民信仰。她的祖母是过去西康著名的女土司，她的叔父是寺中的活佛。”^[20]德钦旺姆出生于 1917 年，其父为第八任孔萨土司丹真尼玛。1935 年，德钦旺姆正式继任土司职位，当庄学本与她在甘孜相遇时，德钦旺姆正值 20 岁的青春年华。据其贴身仆人登真卓玛回忆：“她是一位性格活泼，口齿伶俐，端庄大方，善于交谈，有着纤细的浪漫情怀的姑娘。”^[21]又据其他访客的回忆，或称其“壮健有丈夫气”^{[22]128}，或发现“她能讲一些四川口音的汉语，她还特制了一张乒乓台打打乒乓球，也买了一只汽油灯在晚间照亮，一只留声机开了听听唱片。”^{[23]80}这位追求新思想、新生活的年轻藏族女性，无疑与既来自民国首都南京，又曾任班禅行辕官方摄影师的庄学本，有着诸多可以交谈的话题。

令人遗憾的是，在《庄学本全集》中，有关庄氏在甘孜的行程日记（193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14 日）缺失，我们无法知悉他在当地与德钦旺姆等人的交往细节，但从庄学本为德钦旺姆拍摄的多幅照片推断，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二人应过从甚密。在存世的十余幅照片中，既有德钦旺姆坐立或骑马的个人肖像，也有她与友人的合影，德钦旺姆大多面带笑容，意态闲适。特别是一张摄距很近的特写相片，德钦旺姆没有佩戴任何华贵的配饰，也未展示土司的威严，素颜而微笑地凝视着镜头，其神情之温柔，能够让后世观看者感受到她内心的纯净。12 月 15 日，庄学本离开甘孜，当地官员与土司为其举行送别仪式，在一幅合影中，可见庄学本坐在第一排左首，面带笑容，而德钦旺姆坐于第一排右手第二位，神情颇为落寞不喜。庄氏于当日日记中记载：“早上当地的军政民各界排了队伍在一

里外的平坝上欢送,德清汪姆和县长更远送到一条小河边,递了哈达才告分别。”^[24]⁴²⁷ 其别意殷殷,可见一斑。

时隔多年,当庄学本之子庄文骏先生整理先父遗作时,曾疑惑“父亲为什么为这个女土司拍了这么多?原来父亲在南下时,到甘孜孔萨时,见证了一场历史罕见的为爱情而进行的战争。……父亲见证了这一切,并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后来资料上关于这个女土司的记录,都是使用父亲留下的照片。”^[25]所谓“为爱情而进行的战争”,是指德钦旺姆与九世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吉之间的婚恋以及由此引发的“甘孜事变”。在藏学家降边嘉措撰写的历史小说《最后一个女土司》中,庄学本也成为了这一爱情故事的见证人,他写道:“可惜心性耿直的庄学本没有发现益西多吉和德钦旺姆正暗生情愫,否则他一定会给他们拍摄一张合影照片的。”^[26]⁷⁵ 尽管庄学本与德钦旺姆和益西多吉各有交往——后者与庄氏皆为班禅行辕的同事,但若说他见证了这场“爱情战争”,却与历史事实不符。益西多吉随班禅行辕抵达甘孜并与德钦旺姆相识,是在 1938 年 1 月 18 日之后的事情,而庄学本早于 1937 年 12 月底即抵达康定,并无与二人在甘孜同处的机会。当 1939 年 12 月“甘孜事变”爆发之时,庄学本正在巴塘(时称巴安)调查藏戏与藏族民间故事,亦无可能参与其中。当然,庄学本的确见证了那场政治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时刻,捕捉到德钦旺姆在少女时代最后的天真无邪,这同样是他作为一名摄影家留给后人的历史贡献。

(二)“名亡实存”的丹巴嘉绒藏族土司

1938 年,应著名民族学家、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任乃强先生之邀,庄学本担任了西康建省委员会参议,并兼任西康省通志馆筹备委员,又有了游历西康境内各地区的职司与机会。1938 年 6 月至 7 月,他翻山越岭,前往丹巴县开展社会调查,其中,嘉绒土司在丹巴的辖境分布与统治情势,亦是其调查的主要内容。经过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庄学本在《丹巴调查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丹巴)人民赋性驯良,且聪明活泼,汉化程度较其余番人为高。但土司制度尚

未彻底撤除,不免为政治设施之窒碍。”^[27]他在丹巴考察了丹东、巴底、巴旺、格什咱、章谷屯与二十四村之后,亲手绘制了一幅“丹巴土司辖境图”,以呈现此地错综复杂的政治权力关系。他发现:“土千户制度名亡实存。丹巴土制之演变如下:‘土司’——总保,‘大头人’——村长,小头人——寨首,‘千户’——总村长,‘百户’——村长。土人兴讼,先进土司衙门,对土(司)头(人)等并有上粮当差义务,总保村长依然世袭,其机构及权力与关外土司相同。”^[27]对于见多了康藏地区各路土司的庄学本而言,这些盘踞在丹巴山谷之中作威作福的世袭土官,虽然改换了新式的官称,依然是固守封建传统,对抗时代潮流的一批遗老遗少。

在丹巴考察期间,与庄学本走动较为密切的嘉绒土司是巴底总保王寿昌,他出生于 1917 年,藏名尼玛汪登,系第二十二代巴底“宣慰司”,当时拥有五百余户属民、二百余支枪,是当地武装力量最为强大的土司之一。就在两年,王寿昌曾在“亲信部众的怂恿下,纠集地方武装近千人,袭击红军部队,致使百多名红军战士遭到不幸。”^[28]⁶⁶⁰ 王寿昌此后亦成为国民党在丹巴的要员之一。庄学本初至丹巴县城,便会见了这位年仅 21 岁的土司,与之探讨当地戎女服饰与风俗改良等问题。当庄学本去巴底考察时,王寿昌亦陪同前往,并安排村民表演锅庄舞蹈、造纸工艺、颜料制作等活动,还邀请了一位苯教僧人为庄学本解释教义。在考察途中,庄学本为王寿昌拍摄了两幅照片,其中一幅为面部特写,王寿昌头戴礼帽,面庞清瘦,唇上微髭,双目炯炯有神。另一幅则是王寿昌脱帽站立的全身像,他身穿藏袍,头缠发辫,腰悬嘎乌盒,身后是一座苯教插箭台,似乎是在求卜他将来的命运。

(三)走出大凉山的彝族土司岭光电

1938 年 11 月,庄学本展开他多年边地旅行中最大胆的一次冒险:前往大凉山腹地的彝族世居地区进行考察。依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的描述:“凉山自古为罗罗(彝族旧称)之区,汉人踪迹罕至其地。彝家的大本营在大凉山,不受汉人势力的统治,小凉山则为彝汉往来交易之所,也是两族杂居地带,至统治势力则两方互为

消长。汉人势力兴盛之时,罗罗大部西越黄茅岗,退守大凉山。至汉人势衰,彝家必趁势叛变,出扰小凉山各地。”^[29]⁴ 庄学本前往考察的越嵩、昭觉、冕宁等县,正是大凉山腹心地带,亦是西康省政府无力治理的险恶之地。

庄学本最先抵达的越嵩县田坝地区,是彝族斯补土司岭光电(1913-1989)的辖地。有关岭光电的家支世系与土司源流,任乃强先生曾有介绍:“岭君属僰族(彝族旧称之一)之斯补支,本名斯补木理,世居越嵩县之田坝,为强族。清康熙中内附,受土千户世职,管土民千二百五十户,土目十五员,号煖带田土司,与煖带密土千户,同建衙署于田坝后山,称上下两衙门。同治时,上土司岭国恩、下土司岭承恩以兵力协助川督擒太平翼王石达开,厚蒙封赏,由是亲附汉族,颇习汉仪。光电君,即国恩嫡孙也。”^[30] 岭光电自幼失怙,被四川袍哥大佬羊仁安收养,后在西昌、成都等地接受汉族教育,1933年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至政府部门任职,并重获土司职权,由于有过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学习、工作的经历,岭光电认识到彝族须发展教育、移风易俗,方有存续发展的希望,故在田坝创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校”等机构,以培养融入现代社会的彝族人才。

庄学本在田坝停留十余日,与岭光电朝夕相处,渐成良友。他在多年后撰写的《介绍越嵩煖带密土司岭光电》一文中回忆:“余与岭氏相识于民国廿八年(实为廿七年,即1938年)冬,时余考察西康宁属,遍历夷区,耳岭氏之名,故由大渡河岸绕道先至田坝,然后再入凉山,前后于其所办之斯补学校中停留一旬,再于其附近之麻窝考察三日,故于岭氏之家乡及其建立之事业略知梗概。”^[31] 在岭光电的支持下,庄学本观察彝人火葬、迎娶新娘、毕摩“做和尚”以及规模盛大的丧礼仪式等,获得了很多珍贵的影像民族志资料。

在田坝时期,岭光电常为庄学本讲述彝族的诸多传说与民间信仰,如“岭土司谈昭觉传说,五指笙之发明,有一老妇生五子,因战争而死,老妇制五指笙吹之以资纪念”^[24]⁵¹³;又如“岭光电述:疟疾的夷人哲学:谓疟疾病各种鬼都有,先来热死鬼,故浑身发烧;继来头痛鬼,脑壳

胀痛;再来冷死鬼及呕吐鬼,故寒冷战栗而至呕吐。但诸鬼未带刀,故病不致死云。”^[24]⁵¹³ 岭光电以前者痛惜彝人混战之戕害族群未来,以后者剖析彝人对疾病的迷信认识,都有自我警醒与反思的意味。庄学本评价岭光电:“因久旅内地,深知夷族社会之应改革,夷民智识之应提高,乃先从教育着手,创办斯补学校于其土署之侧……经其数年惨淡经营,成绩极佳。此外岭氏复积极为夷民改良陋俗,禁烟戒酒,取缔早婚,提倡卫生,同时又造林开堰,栽种桐树,以发展夷人之经济。”^[31] 庄学本于西部边地会见的诸少数民族土司中,对岭光电土司的赞誉最为真挚热烈,感佩之情,溢于言表。临别之际,二人留合影于斯补边民小学的校门外,共期岭光电能够除弊革新,带领凉山彝族民众挣脱桎梏,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

四、结语

自1934年至1939年,庄学本先后游历四川、青海、甘肃、西康等边区的土司辖地,与中国最后一批土司往来交际,有意无意地记录了他们的时代样貌。仿佛是一个“历史的幽灵”,庄学本见证了20世纪前半叶西部土司的兴衰,却从未在当地的叙事中留下深刻的印痕,但他又真切地与这些土司产生过或深或浅的联系,无论是兄弟结义,还是记述交往,特别是为他们拍摄了一幅幅个性鲜明、气韵生动的肖像照,留存下那个时代各民族政治精英的真实影像。对于他曾交往过的各方土司,庄学本有着不同的好恶与评价。他欣赏杂古屯守备杨继祖、田坝土司岭光电这样的变革者,冀望于他们发展教育、改良生计,带领族人获得进步;他与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巴底土司王寿昌等人保持着微妙的距离,既承认他们有蓬勃的雄心与领袖气质,又质疑他们统治属民的残酷制度,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治窒碍。对于青海土族的李承襄土司以及群科滩右翼正盟的蒙古族郡王林沁旺济勒,庄学本看到的是土司政治最终没落之后的迟暮景象,曾经不可一世的“土皇帝”也被迫务农放牧,泯然众人,但是以马步芳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却并未带来更好的制度,以军阀代替土司,民生反而更趋恶化。相形之下,庄学本与阿坝墨桑土司华尔功臣烈、甘孜孔萨女土司

德钦旺姆之间,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情和好感。至少在他游历川西北的雪山草地时期,庄氏与华尔功臣烈的交往宛若家人、情似兄弟,而德钦旺姆能够卸脱掉平日的威严面具,在庄学本的镜头前展现其柔软、欢愉的一面,想必也带有些超越主客关系的亲情意味。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庄学本只是一名偶然出现在中国西部边地的过客,土司才是各自故事中的主角。在其后十余年间,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于回光返照时表演最后一幕悲喜剧。在庄学本熟识的土司当中,杂谷屯土司杨继祖(后更名为杨纯武)于 1950 年率部起义,“后任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协副秘书长,并于 1959 年 10 月 1 日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32] 1951 年 8 月,卓克基土司索观瀛迎接解放,先后担任过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阿坝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等职务。墨桑土司华尔功臣烈于建国后历任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副主席、阿坝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巴底土司王寿昌在 1949 年通电起义,于 1953 年担任丹巴县长,更主动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土司制度,交出土地、枪支弹药”^{[28]661},成为土司制度的掘墓人。彝族田坝土司岭光电后期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为彝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即便是垂垂老矣的林沁旺济勒郡王,也曾作为青海蒙古族代表,参加了 1950 年的国庆节进京观礼活动。在庄学本相识的诸位土司中,唯有孔萨女土司德钦旺姆命运多舛。“甘孜事变”之后,她与丈夫益西多吉被迫流亡至青海,直到 1946 年底才返回故乡。1950 年,西康和平解放,德钦旺姆曾担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但因长期忧虑与病痛,她不久后便英年早逝,享年 37 岁。

综观这些曾与庄学本有过人生交集的末代土司,大多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有着建功立业的野心与翻云覆雨的能力,在中国西部雪山草地之间纵横捭阖。有人试图延续古老的制度,也有人尝试革除旧弊,建设新政,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他们最终审时度势,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彻底放弃土司的身份与权力,踏上人生的一条新路,悲欣交集,载沉载浮,最终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们年轻时的模样早已无人知

晓,曾经的尊严与浪漫也尽付尘埃,惟有当年被一个异乡青年拍下的瞬间,凝聚成不朽的影像,还在讲述尘封的往事,庄学本用他的故事告诉世界:“他们何尝是‘蛮子’,是‘异族’?不过是隔离较远的兄弟而已。”^{[4]3-4}

注释:

①即九子屯,笔者注。

②参见纪录片《寻找庄学本》访谈内容,导演亚利桑德罗·加卢奇(Alessandro Galluzzi)等,黑龙江广电等机构出品,2014 年。

③张琦,罗布藏《淋沁旺济勒先生的生平事略》,选自政协海晏县文史资料组编写的《海晏文史》,内部资料,1993 年第 145-146 页。

参考文献:

-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58.
- [2]田利军.民国时期川西北土司土屯部落变动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0,31(05):119-127.
- [3]贺国光,谢培筠.川康边政资料辑要:理番[Z].成都:祠堂街玉林长代印,1940.
- [4]庄学本.羌戎考察记[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
- [5][美]葛维汉.葛维汉在华西[M].卞思梅,彭文斌,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22:129-130.
- [6]Reve. T. R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M]. Chicago, Daniel Shaw Co:37.
- [7]徐吉廷.追寻《羌戎考察记》中理县人物的踪迹[J].今日民族,2014(12):34-37.
- [8]理县志编纂委员会.理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 [9]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坝州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 [10]庄学本.庄学本全集(上)[M].上海:中华书局,2009.
- [11]张嘉友.四川袍哥简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 [12]王田.民国时期川西北鸦片种贩与族群政治——以杂谷脑河流域为中心[J].学术界,2015(11):194-204+327.

[13] 安波. 袍哥势力对羌族地方社会权威和秩序的影响——以民国川西北白草河流域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5(03): 52-61.

[14] 政协马尔康县委员会, 阿坝嘉绒文化研究会. 雪山土司王朝——卓克基第十六代土司索观瀛传[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

[15] 都爱国. 刚柔相辅, 深明大义——记草地藏族领袖人物华尔功成烈[C]. //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51-52.

[16] 辛存文. 民和土族东伯府李土司世系考察[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81(03): 81-98.

[17] 庄学本. 青海旅行记(三)[J]. 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 1937(7): 161-162.

[18] 张寿年. 明代金书铁券的历史价值[J]. 湖北档案, 1998(02): 37-38.

[19] 庄学本. 青海旅行记(续): 群科滩蒙旗(三)[N]. 申报, 1936-05-10(第3张第11版).

[20] 庄学本著, 马翊辉, 王昭武, 庄文骏主编. 尘封的历史瞬间[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 167.

[21] 泽仁翁姆. 甘孜孔萨女土司——德钦旺姆[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7, 26(04): 6-10.

[22] 贺觉非.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M]. 林超校,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23] 谢天沙. 康藏行[M]. 胡博整理,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24] 庄学本. 庄学本全集(下)[M]. 上海: 中华书局, 2009.

[25] 庄文骏. 庄学本七十年前自我的消失[J]. LADY 格调, 2013(5): 82.

[26] 降边嘉措. 最后一个女土司[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27] 庄学本. 丹巴调查报告[J]. 康导月刊, 1939(7).

[28]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志编纂委员会. 丹巴县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6.

[29] 林耀华. 凉山彝家的巨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30] 任乃强. 我所知道的夷族土司岭光电先生[J]. 边疆通讯, 1947(8-9): 18.

[31] 庄学本. 介绍越嵩暖带密土司岭光电[J]. 边疆通讯, 1947(8-9).

[32] 徐吉廷. 追寻《羌戎考察记》中理县人物的踪迹[J]. 今日民族, 2014(12): 34-37.

收稿日期: 2025-06-08 责任编辑: 秦 艳

Brothers in the Distance: A Study on Zhuang Xueben'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nvestigation with *Tusi* of the Western China

Zhu Jingjiang^{1,2}

(1. School of Movie and Media,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Sichuan, China;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JOURNAL OF ETHNOLOGY, VOL. 16, NO. 09, 82–92, 2025 (CN51–1731/C, in Chinese)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5.09.009

Abstract: From 1934 to 1939, ethnographic photographer Zhuang Xueben conducted fieldwork in Sichuan, Qinghai, Gansu, Xikang, and other regions. During this period, he met numerous *Tusi* (hereditary native leaders) of Tibetan, Tu, Mongolian, and Yi ethnic groups, establishing close contacts with some progressive figures among them. Most of these last-generation *Tusi* were influential figures of their time. Eventually, amidst the sweeping tide of history, they gave up their status and power as *Tusi* and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in life. Zhuang Xueben's diaries, reports, articles, and photographic works presented the *Tusi* system, local traditions, and ethnic cultures of that period from a folk narrative perspective. His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also showed the historical details and human dimensions of *Tusi* politics, providing precious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Tusi*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wester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his “Qiang and Jiarong Tibetan Investigation” from 1934 to 1935, Zhuang met many *Tusis* in north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during a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Yang Jisheng, the Chief of Jiuzi Tun, was addicted to opium, yet the Jiuzi Tun under his jurisdiction was not isolated. Yang Jizu, the Chief of Zagu Tun implemented new policies such as abolishing old rituals and emancipating slaves. Zhuang also became sworn brothers with Wang Yinsan, the district director of Zagu Nao, and Yang Jizu. Suo Guanying, the *Tusi* of Zhuokeji was a leading figure of *Tusis* in the Situ area. Zhuang once persuaded him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national system. Additionally, Zhuang became brothers with Huaergong Chenlie, the *Tusi* of the Mosang tribe, and advised him to align with the times and promote local development. During his investigations in Gansu and Qinghai from 1935 to 1937, Zhuang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 *Tusi* of the Tu and Mongolian ethnic groups. The *Tusi* of the Tu ethnic people in Qinghai, such as Li Chengxiang, had lost their authority due to the “reform of replacing *Tusi* with officials”, and Zhuang was able to take photos of the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of his family. Although Mongolian princes in Qinghai and Gansu, such as Linqinwangjile, were knowledgeable, suffered oppression under the Ma Bufang group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eading to a gradual decline in their influence. Zhuang documented their worsening living conditions. During his investigation in Xikang from 1937 to 1939, Zhuang interacted with many *Tusis*. He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s with Deqin Wangmu, the female *Tusi* of the Kongs tribe in Ganzi county, taking many photos of her and witnessing the last tranquility before the “Ganzi Incident”. Although the Jiarong Tibetan *Tusis* in Danba — such as Wang Shouchang — changed their official titles, they still retained the essence of the *Tusi* system. Zhuang additionally became a good friend with Ling Guangdian, a Yi *Tusi* of Liangshan, and appreciated his initiatives like establishing schools and reforming less developed customs.

Zhuang evaluated the *Tusis* he interacted with differently, and he witnes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se last-generation *Tusi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st *Tusis* conformed to the times, took up new positions in the government, and contributed to loc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progress. Zhuang's records broke down ethnic cognitive barriers and showed brotherly friendship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rough their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 *Tusi*; Zhuang Xueben; western ethnic groups; social interaction; visual documentation